

## 群峰並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書系》編者按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逾兩世，人們討論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或強調其間的斷裂性及變革意旨，或著眼其整體性和連續性。這一談論以至爭論當然不是清談，背後指向的乃是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長遠的道路選擇。

《三十·三十書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獨立開放的學術出版平台，使不同學術背景、不同立場、不同方法的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識場域充分完整地展開。期待群峰並峙，自然形成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問辯，而峰峰相映，帶來更為遼闊和超越的認識景觀。

本書系自2013年開始出版，致力於推出全球視野下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重要研究。研究者分別從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優秀傳統和全新視角出發，突破地域界限、學科壁壘和既往研究在方法與對象上的框限，為這一領域引入了種種具有前瞻性、成長性的研究方向，共同呈現了一個開闊而富有生機的中國研究圖景。無論主題、關懷、方法，這些作品之間既有照應和互補，也不乏衝突與砥礪。當它們在同一平台上呈現時，恰恰拼出一個豐富而多元的光譜，正切合了《三十·三十書系》所期待的學術景觀——群峰並峙，峰峰相映。

秉承這一理念，本書系將繼續追蹤關於共和國六十年的前沿研究，兼收中文原創著作及譯著。本社一貫注重學術翻譯，對譯著的翻譯品質與對原著的學術價值要求，共同構成學術評審的指標。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精神所在。以此精神為感召，本書系將繼續向不同的學術立場開放，向多樣的研究理路開放，向未來開放，歡迎學界同仁賜稿、薦稿、批評、襄助。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2024年1月

電郵：[cup-edit@cuhk.edu.hk](mailto:cup-edi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中文版序言

我很高興能向中國讀者介紹這部作品。有別於英語國家的很多讀者，中國讀者們可能對文化大革命已有所認識，而本書的研究成果將挑戰這些固有的看法。諸多基於回憶錄以及對單位和特定城市研究的中文文獻，都強調學生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的破壞性行動與暴力行為。本書從縣級以上政府出版的2,200多份地方志中提取數據並進行匯編，從全新角度探討了1966年底到1968年這一文革中最具暴力和破壞性的階段。

在這些材料裏最出人意外的發現，是這一時期混亂的主要源頭並非來自學生和工人造反派，而是黨和國家官員在地方層面的行動，以及地方部隊為恢復一定的政治秩序所造成的結果。從材料中可以清晰看到，1967年1月到1967年3月期間，中國的地方政府出現了崩潰的危機。在當時，從縣城到省城，近八成地方政府的黨支部已被地方造反派推翻，其餘地方政府大多陷入癱瘓，基本喪失了權力。中國國家結構的迅速崩潰帶來了這樣的疑問：是誰進行了對地方政府的奪權？地方史料表明，只有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才有規模大、力量強的學生和工人造反派來挑戰地方官員。然而，奪權運動蔓延極快，遠遠超出了大城市的範圍，甚至波及到偏遠的農村縣城，而在這些地方，紅衛兵和工人造反組織基本上不存在，實際上，也少有學生和城市工人。

那麼，又是誰推翻了地方政府？事實證明，這是一股在1966年末突然崛起的力量，出現在黨政機關內部——普通幹部們組建了造反組織，以推翻自己的領導。這些造反幹部被稱為「機關造反派」，是推翻中國各地地方領導的主力，也將文化大革命導向了最暴力的階段。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政治秩序是被「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所破壞，但本質上，中國的政治秩序是「自內而外」崩潰的，是由城市和縣級政府中原本紀律嚴明的幹部對自己的上司發起了造反。

這一波地方政府的倒台並沒有帶來穩定的新政府，反而導致地方軍隊（包括人民武裝部）加入，並成為唯一可以替代倒台的地方政府的機構，這使得軍事單位首次介入了政治衝突。軍官們支援哪些造反團體的決定形成了大規模的派系，而這些派系參與的街頭武鬥往往類似於從1967年夏天開始的地方內戰。得到地方部隊支援的造反派幹部和工人形成了支持軍隊管控秩序的派別，而反對地方部隊決策的造反派幹部和工人則譴責軍隊鎮壓造反運動。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央政府無法決定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從而延續了地方衝突。兩個派系的地方造反派都獲得了軍事武裝（有時解放軍的不同部隊更會支援不同的地方派系）。因此，旨在平息1967年初的混亂和派別紛爭的軍隊干預無意中產生了相反的效果，不但製造出了新的派系、延續了衝突，更導致這種暴力衝突日益升級。

從這些材料中得出的統計數據清晰地展現出，儘管早期的學生紅衛兵運動具有破壞性，他們的暴力行為所導致的死亡只佔據文革時期死亡人數的極少部分。從1967年夏季到1968年，在已公開的歷史記錄中，遍布中國廣大地區的地方造反派之間的知名武鬥造成的死亡人數大約不超過整體死亡人數的15%。而文革中最具暴力性的死亡記錄集中在1968年下半年，並與革命委員會（革委會）的成立密切相關——革委會是文革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死亡人數最多之時，正是軍隊在鎮壓最頑固且全副武裝的造反派團體之時，或者革委會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等政治運動、以期建立更穩定的全新政治秩序之時。我們只能得出一個可悲的結論：秩序的重建遠比動亂本身更具有破壞性。

最後一個發現與統計計算有關，涉及中國近代政治史上這個充滿暴力但仍然鮮為人知時期的死亡人數統計。對這些材料的仔細統計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80年代進行的調查顯示，當時的死亡人數估計接近160萬。這一個數目無疑是非常巨大的，但中國因人口眾多，文革中的死亡率其實遠低於其他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內部衝突，只是大致相當於1930年代末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清洗或是1965年印尼軍隊進行的大屠殺的一半左右。關於文化大革命這一階段的人道代價，也許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人是在嚴厲的批鬥後倖存下來。在這個時期的政治迫害中，每十七位受害者中只有一位會因此喪生。不論是與蘇聯或印尼所記錄的情況相比，還是與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或1994年的盧安達等更致命的案例相比，中國文革的死亡人數比例顯得微不足道。統計數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倖存受害者的人數，這無疑促使了1976年後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堅決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紛爭拋在腦後，將國家引導向更為積極的方向。

本書的譯者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仔細考慮了如何將這一系列複雜的研究成果用中文表述出來。本書的英文版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書名確定為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英文中「agents」一詞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指在造反行動中擾亂中國政治秩序的行動者，也指黨和國家的代理人，分別象徵主動及被動的角色。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中國特有的黨政結構促使各種造反組織推動集體行動，特別是包括幹部、解放軍、地方人民武裝部，以及農村裏的民兵在內的集體行動。這些行動者通常是負責維護政治秩序的黨和國家的代理人，但是在1967年初，他們的造反運動反而促使基層政權迅速崩潰，並且加劇了隨之而來的政治暴力。本書的中文書名——《失序的造反：文革初期集體行動的內在機制》——正是意在揭露出這些行動者是如何從黨和國家的代理人轉變成破壞政治秩序並激發暴力衝突的這一不為人所知的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 英文版序言

我從未想過要成為一名歷史社會學家。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興趣始於上世紀70年代初的本科時代。彼時，文革只是剛剛發生的事件。和幾乎所有其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生一樣，後毛澤東時代的驚人變化很快將我的注意力從文革動蕩這個話題轉移開來。直至近年我才回到這個長期被忽視的話題，並發現我大概因為拖延而成為了一名歷史社會學家。對於推遲了對文革的深入研究，我感到非常幸運，因為現在相關的研究材料比幾十年前研究者所能獲得的要多得多。

20世紀70年代末，當我還是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名研究生時，就埋下了進行這項研究的種子。我在社會組織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 有一個自己的辦公桌，在那裏一待就是好幾年。該中心設在一所略顯破舊的小學舊址內，有一段時間這裏成了我的知識家園。中心主任查理斯·蒂利 (Charles Tilly) 領導一個龐大的研究團隊，從英國和法國舊報紙的縮微膠捲中收集集體抗議的數據，並將其編碼成當時所謂的「機器可讀資料庫」。蒂利當時是定量歷史社會學的領軍人物，這項工作是一場重塑集體行動和民眾抗爭研究的新興思想浪潮的一部分。這一領域及相關領域的其他重要人物，包括威廉·甘姆森 (William Gamson)、傑夫里·佩奇 (Jeffery Paige) 和梅耶·扎爾德 (Mayer Zald) 也在中心有辦公室，同時還有一些研究生，共同在中心從事針對不同時期和地點政治衝突的研究。中心的午餐會、工作坊、系列講座，

x 或是一邊喝(糟糕的)咖啡一邊討論,這些交流皆營造出一種令人興奮的知識氛圍。在我的研究生教育中,這些活動與正式的課程同等重要。

我最初選擇專攻中國研究,是因為我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動蕩有著濃厚的興趣。這是中心知識活動的核心主題,我不斷通過使用在中心流行的理論視角思考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衝突。不幸的是,在那些年,中國對學者們抱持封閉的態度,學者均沒有辦法獲得那一時期有關衝突的文獻。我只能夢想著以密歇根大學當時普遍的方式分析文革。

我對文革的興趣從未減退。隨著1980年代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開始批判性地審視其近期的歷史。在此過程中,大量新資訊湧現出來,重新激發起我對文革時期衝突的興趣。在後毛澤東時代早期,中國政府強制要求出版地方志,其中許多對文革期間政治事件的詳細描述令人驚訝。考慮到這些材料在系統分析造反和鎮壓方面的潛力,我開始影印地方志中包含政治事件資訊的部分。隨著更多地方志的出版,我加快了收集工作的步伐,從而實現了幾乎收集齊全中國地方縣志的目標。

到1997年加入斯坦福大學時,我收集的資料已經包括了中國三分之二的市縣。在香港、美國以及偶爾在中國大陸的圖書館繼續收集資料的同時,我聘請了一些研究生嘗試將這些資料編碼成資料庫。2009年,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這項工作最終得以完成,資料庫包含了2,246個市縣近3.4萬個政治事件的資訊,可以說是覆蓋了中國除幾十個縣以外的所有地區。該資料庫及其所依據的最詳細的敘述構成了本書的主要基礎。

xi 我特意從專門研究造反運動和集體行動的社會科學家的視角來審視這一主題。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這些仍不為人所知的動亂貢獻新的歷史知識和新的解釋,儘管我不得不填補這一時期史學中的空白。我還希望從對這些事件的分析中總結出一套觀點,為社會科學家分析造反和鎮壓等現象的方式做出貢獻。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特殊的,在許多方面都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但它又是由一般性過程所推動,這些過程在不

同歷史背景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被觀察過。我的目的就是揭示這些潛在的機制，識別特殊過程中的一般過程。

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是歷史社會學無可爭議的大師，他對政治現象的社會根源非常感興趣。他對專制和民主社會起源的研究啟發了多個學科的幾代學者。二十多年前，我在哈佛大學工作期間，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因為共同的學術興趣和出海遊覽塞勒姆港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跟他那一代的許多學者一樣，對他來說，群體如何被動員起來採取政治行動的問題顯然是次要的，更根本的問題是他們為甚麼會形成某種政治取向。而在當前的政治運動研究中，尤其是在社會學研究中，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退居次要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本書是對上一代學人關注點的回眸。出於對巴林頓學術成就的欽佩和對這位老朋友的緬懷，我將此書獻給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